

From

ANTAGONISM

从对抗到对话

郑羽 著

To

DIALOGUE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苏美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从对抗到对话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苏美关系

郑 羽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对抗到对话: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苏美关系/郑羽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9

ISBN 7-5004-2313-6

I. 从… I. 郑… II. 美苏关系-国际关系史 N.D85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2223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100720)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125 插页:2

字数:206 千字 印数:1—3000 册

定价:16.00 元

序 言

1992年以来，追寻和探讨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一直是国内苏联——俄罗斯研究学界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内同行们不断地从政治、经济、民族问题和对外政策等领域对苏联解体的诸原因作出自己学术上的解释。毫无疑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苏联在对外政策上的一系列严重失误，是导致苏联1991年末最终解体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在笔者看来，正是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美两国真正开始了围绕着两种制度谁战胜谁的全球性较量。因而，研究和梳理这一时期苏联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政策的得失及其遗产，或许能对在源头上解释苏联解体的外交原因有所助益。

本书在写作结构上，首先将战后斯大林时期的对外战略和对美政策作了扼要但不失系统的阐述，力图概括地描述出战后初年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总构想和对美政策的基本走向，从而说明赫鲁晓夫执政之初所面临的苏联外交遗产和国际局势，以及赫鲁晓夫加以调整和改革的苏联对外战略的原有面貌。本书的中心内容的叙述程序是，在赫鲁晓夫对外战略的总体中把握赫鲁晓夫时期的对外政策，因而，本书系统地论述了赫鲁晓夫新的对外战略的理论基础，外交策略和赫鲁晓夫的外交哲学，并在其中阐述了他对斯大林对外战略理论和策略的改革调整和继承。在此基础上描述和评价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对美政策时，本书就能够把握它的目标模式以及各项具体政策的内在联系。

本书将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对美政策和苏美关系分为三个层次和五个范畴。第一层次是苏美的双边关系，其中包括两国互为目标的军事战略，两国的裁军对策和双方经济关系的态势及其演变三个范畴；第二层次是在两国领导的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政治

集团的对峙中体现出的苏美关系,这基本上集中在欧洲范围内;第三个层次是苏美在第三世界的角逐,即阐述苏美在第三世界国家展开外交活动,扩大自己的影响所出现的利益碰撞和在这一领域建立起来的关系规范。这种划分的依据是,苏美关系与小国之间的关系不同,小国间的关系只具有双边意义或地区性意义,而苏美却是两极结构下各自代表着一极的世界性大国,无论其外交活动领域和价值目标,还是其利益范围,都是世界性的,双方都希望每一个国际问题以有利于自己,不利于对方的方式解决。如果说欧洲是双方外交活动的主要领域,那么,第三世界由于其国家众多,疆域辽阔,必然成为两国激烈竞争的场所。这样,苏美关系的作用范围就覆盖到全球各个地理领域和各个问题范畴。

本书在探讨和阐述问题时采用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两个方法。其一是由个别到一般和由一般到个别的方法,也即从赫鲁晓夫对 50 年代中期以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诸多问题的新认识和新观点中,抽象地概括出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开始以后苏联新的对外战略,然后又由一般到个别,在把握苏联这个时期整个对外战略基础上描述和分析这一时期的苏联对美政策和苏美关系,这样,既能够说明苏联对美国的每个具体政策的宏观归宿,又能把握每个具体政策间的内在联系。另外,本书还力图从各个具体历史事件的分析叙述中,概括出这一时期苏美之间形成的较为稳定的关系规范,而且本书还特别努力于描述出这一时期在两极结构的条件下苏美关系运行的诸规律。其二是采用事物“只有在运动中才表现出自己是什么”(恩格斯语)的认识论方法。在考察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美政策时,本书首先描述了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战略和对美政策,以图说明赫鲁晓夫对外战略和对美政策的起点和背景,本书还扼要叙述了赫鲁晓夫的理论 and 政策遗产对其后继者的影响,力图通过前瞻和回顾,在动态中把握赫鲁晓夫对美政策的得失,进行中肯和准确的分析与评价。

本书的主要观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斯大林在分

析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诸问题时，例如在分析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两大社会体系间矛盾与竞争的领域和形式以及和平共处问题时，没有顺应变化了的国际环境，理论观点和思维方式都显得过于极端和僵化，因而对外战略和对美政策的制定也显得僵化和偏执，再加上对外政策上的大国主义倾向，使得战后初年出现的尖锐冷战态势没有得到及时的化解，对美政策也由于过于僵硬而出现了一些失误。赫鲁晓夫执政以后，在新的基础上分析了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反映国际客观条件变化新的理论原则和重要论点，例如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核武器的出现在军事领域造成了根本性变革，两大社会体系间的矛盾可以缓和，经济竞赛应成为两大社会体系间竞争的基本形式，等等，并在此基础上调整了以往的政策，制定了新的对美政策和方针。本书认为，赫鲁晓夫的对外战略和对美政策的积极方面在于，它反映了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在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中造成的革命性变革；反映了战后科技革命和殖民体系崩溃造成的发达国家内部经济运行机制中超经济强制（用对外战争推动资本输出和占领原料及销售市场）因素的削弱所出现的新的国际竞争形式；反映了核武器的出现给战争问题造成的根本性变革；反映和顺应了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冷战要求和平的共同愿望；使冷战格局下出现了有限缓和，对抗走向了对话，为国际社会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建设和发展赢得了相对和平的国际条件；使战后遗留问题的解决有所进展，并为其进一步解决创造了较好的基础；为解决战后苏美关系问题和两大国社会体系对抗问题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思想观点和政策原则。

同时本书也指出，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和主观认识上的偏差，这个时期的苏联对外政策和对美政策也存在着一系列严重失误：

第一，低估了两极状态下缓和两大阵营间矛盾的困难程度，把改善苏美关系所能达到的目标过于理想化，对于与美国在各领域建立全面合作与和平竞赛关系，存在幻想，看不到资本主义和社

会主义两大体系的基本矛盾。其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双方充其量只能达到一种有限的缓和，这一方面是由两大社会体系的基本矛盾决定的，另一方面又是两极结构的国际条件决定的。

第二，在裁军谈判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的情况下，苏联也陷入了军备竞赛的泥潭。其客观原因是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苏联周边地区拼凑一系列遏制苏联的军事联盟集团，主观原因是苏联自己的谋求军事力量优势以控制世界的政策原则。

第三，在美国在第三世界拼凑一系列地区性军事集团的情况下，苏联在其对第三世界的外交活动中也表现出了忽视这些国家的民族特点和利益，急于将这些国家纳入自己的阵营体系，并在这些国家推广自己的政治经济模式的倾向，反映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大规模的武器输出，既造成了地区性冲突的加剧，也引起了苏美两国对抗的加剧。

第四，赫鲁晓夫关于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思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完全错误的。苏联外长葛罗米柯曾说：“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苏美两国之间有合作和信任，就会有和平，在苏联政府首脑尼·谢·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肯尼迪之间达成协议，决定人类命运的国际问题就会得到解决。”按照这种思想，苏美有权干涉世界各地的任何问题的解决，而且只有苏美两国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就必然导致苏联干涉别国事务，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忽视和损害第三国利益的霸权主义和支配主义倾向。

第五，赫鲁晓夫时期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和苏联的有关政策，虽然在某些方面比斯大林时期有所进步，但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那一套，有时甚至比斯大林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本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的。本书能够完成，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中国苏联东欧史学会会长陈之骅教授。在他的富有成效的指导下，我得以顺利地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业。同时，我也愿借本书出版的机会，表达我对我妻子李燕的深深谢忱。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她对我从事的只能带来清苦的学术研究的支持始终未曾动摇，这常常使我因自己的学术成绩太少而惭愧。最后我还要感谢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本书在他们的帮助下得以问世。

由于本人学术水平和阅历的限制，本书肯定有很多有待商榷之处，恳请学术界的前辈，同仁和读者批评指正。

郑 羽

1998年2月于北京丰台大井村

CONTENTS

PREFACE

CHAPTER ONE:

STALIN'S DIPLOMATIC HERITAGE: SOVIET FOREIGN POLICY AND POLICY TOWARD USA IN EARLY YEARS POST WORLD WAR II

1. Positively Defense Strategy Before Cold War , 1945 — 1947.
2. Antagonistic Strategy Based on the Camp in Years of Cold War, 1947—1953.
3. Formation of Two-Polar Antagonistic Pattern between USSR And USA Post World War II.
4. The Fields of Cold War Relationship between USSR And USA.

CHAPTER TWO:

THEORETICAL BASIC AND TACTICS OF SOVIET FOREIGN STRATEGY AND IT'S DIPLOMATIC PHILOSOPHY IN KHRUSHCHEV YEARS.

1. Practical Reasons of Theoretical Rethinking: The Losses of USSR in Sharp Cold War.
2. Evolution of Theoretical Basic of Foreign Strategy .
3. Adjustment of Diplomatic Tactics and New Diplomatic Philosophy.
4. Khrushchev's Carrying on Stalin's Theory and Tactics.
5.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lements for Making of

Khrushchev's Foreign Strategy.

CHAPTER THREE: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HIP IN KHRUSHCHEV YEARS (PART ONE)

1. Soviet Viewpoint about the Position of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hip and Khrushchev 's Aim for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hip.
2. Mutually Confronting Military Strategy between USSR and USA.
3. The Struggle between USSR and USA in Disarmament Field.
4. Soviet Foreign Economic Strategy and Soviet-American Economic Relationship.

CHAPTER FOUR: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HIP (PART TWO)

1. Soviet-American Confrontation in Europe.
2. Soviet-American Rivalry in the Third World.
3. The Regimes of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hip in Khrushchev years.
4. The Rules of Performance of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hip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Two-polar World.

CONCLUSION:

DIPLOMATIC HERITAGE OF KHRUSHCHEV 'S POLICY TOWARD USA AND IT'S IMPACT ON THE SUCCESSOR.

第一章

斯大林的外交遗产：战后初年 苏联对外战略及对美政策 (1945~1953)

任何一国的对外战略，作为该国的大战略，反映了它的政治经济利益和在国际舞台上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等多种因素，有着很大的继承性。这种继承性，一方面是由该国政治经济利益的恒常性决定的，另一方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意识形态传统所规范的价值目标体系的稳定性。在赫鲁晓夫执政年代，斯大林对外战略不仅作为一种传统在起作用，而且也留下了反映在当时国际关系格局中的外交遗产。因而，赫鲁晓夫在制定并形成自己的对外战略原则之前，首先面临着一个双重任务，既要在理论上反思斯大林对外战略，又要在实践上对其进行现实的调整。这种新战略又必然带有很多它所走出的那个时代的痕迹。

第一节 冷战前的积极防御战略（1945~1947）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于1945年9月在亚洲最终熄灭的时候，苏联作为消灭德国法西斯势力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国家，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而在这同时，苏联也为战争的胜利负出了空前惨重的代价，根据苏联自己的统计，战争中共死亡和牺牲2000万人（占当时人口的1/10），负伤致残几百万人。1710个城市和工人镇，7万多个乡村夷为平地或部分焚毁，31850个工业企业遭到

破坏，98000 个集体农庄，1876 个国营农场和 2890 个机器拖拉机站被战火所洗劫，直接损失达 6790 亿卢布，占当时苏联国民财富总额（20000 亿卢布）的 30%，如果加上间接损失，这个数字可达 25000 亿卢布以上。^① 战争对苏联国民经济的巨大破坏的客观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后初年苏联对外战略的取向。加之，战时苏美两大国结成的联盟关系还没有破坏，两极世界这时还没有形成，虽然这时苏联领导人在战后立即提醒本国人民注意新战争的危险，苏联这时的对外战略还不具备与美国对抗的特点和性质，而基本上是按照以下三个方向展开的：以和平民主的方式解决战后遗留问题，消除战争根源，铲除法西斯残余，推进战后各国，尤其是轴心国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在与苏联接壤的国家和地区尽可能建立与苏友好和亲近的政府，形成阻隔西方的环绕苏联的安全带；为建立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而努力，以利于苏联战后的国力恢复，尽量避免与当时实力雄厚的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这两年内苏联对外战略可以称做“积极防御战略”。

在东欧诸国建立与苏友好的政府

东欧是否存在与苏联建立友好睦邻关系的政府，这是苏联在战争前夕就已经开始特别关注的问题。为了保证自己西部领土的安全，从 1939 年 9 月到 1940 年 8 月，苏联在北起芬兰湾南至德涅斯特河口的西部边境地区，建立了经由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维斯杜瓦河以东的波兰领土—罗马尼亚的北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安全带”。在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再次表示了对此问题的关注。他说：“不要忘记以下的情况。德国人侵入苏联是经过芬兰、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德国人所以能够经过这些国家侵入苏联，是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当

^① 苏联部长会议中央统计局编：《苏联国民经济六十年》，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3 页。

时存在着敌视苏联的政府。”^①这实际上表达了当时苏联在东欧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苏军的大量驻扎，这是战后初期苏联与东欧关系的一个显著特点。还在1944年8月末，苏联红军在取得了白俄罗斯战役的胜利之后，开始进入波兰和罗马尼亚，9月中旬，苏联红军占领了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10月份进入南斯拉夫首府贝尔格莱德，1945年2月，又开进了匈牙利的都城布达佩斯，在1945年4月柏林战役开始前，苏军已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的大部分。在1945年春季，在东欧的苏军共有7个方面军，共670万人。^②因而在战争末期，英美即开始关注与苏联划分在东欧的势力范围的问题。1944年10月中下旬，为准备1945年初召开的雅尔塔会议，英国首相丘吉尔到莫斯科与斯大林举行会议，达成了著名的关于巴尔干诸国势力范围划分的百分比协定：

罗马尼亚 俄国 90% 其他国家 10%

希腊 英国（连同美国）90% 俄国 10%

南斯拉夫 50%—50%

匈牙利 50%—50%

保加利亚 俄国 75% 其他国家 25%^③

关于波兰和德国问题，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又与英国进行了激烈的唇枪舌剑的斗争。英美一方全力支持流亡伦敦的米科拉伊奇克政府，而苏联则支持波兰工人党领导的临时人民政府，双方最后达成了有利于苏联方面的妥协，三国决定在波兰建立以原波兰临时人民政府为核心的临时民族团结政府，只容许流亡伦敦的

① 斯大林：《关于丘吉尔先生的演说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64页。

② 弗·沃尔科斯基，弗·西波尔斯：《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莫斯科1985年俄文版，第37页。

③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W. Churchill, Second World War），第六卷，1954年英文版，第227～228页。

政府的少量代表参加。三国还决定吸收法国组成四大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因而，可以说在苏德战争结束前，苏联已经与英美在东欧问题上达成了比较有利于苏联的正式协定与默契，这是由于在太平洋逐岛争夺战中遇到日军顽强抵抗的美国，力图劝使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以消灭 100 多万日本关东军。加之苏联数百万大军驻扎在东欧已是既成事实，因而不得不对苏联作出一定的让步。

然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直至 1947 年春季冷战格局正式形成之前，无论英美反对与否，苏联并没有力图在东欧八国建立清一色的共产党政府，而是以建立对苏友好和睦的东欧各国政府为其政治目标的。证据一，无论是 1944 年 10 月的百分比协定，还是 1945 年 2 月的雅尔塔会议，都没有对捷克斯洛伐克战后政府的组成作具体的规定。但在 1945 年初，斯大林就曾说服捷共总书记哥特瓦尔德与流亡伦敦的原总统贝奈斯组成联合政府，经过 3 月中旬在莫斯科七个党派的协商，联合政府于 4 月初在斯洛伐克第二大城市科息斯正式成立。证据二，战争结束后，苏联即要求从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和东德获得战争赔款，并且切实得到了巨额赔款，并且从波兰（布列斯特以东）、罗马尼亚（北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和德国苏占区（东普鲁士的科尼斯堡地区）割去三国领土，大规模迁徙了当地居民。而如果苏联打算在这些国家建立由从莫斯科回国或与苏联联系紧密的东欧各国共产党控制全部国家政权的清一色政府，当然会考虑到这种做法会使共产党在本国处境艰难。证据三，苏联在支持并促进战后初期建立南斯拉夫联合政府问题上的立场，也能够证明上述观点。1944 年下半年，苏联即劝说坚决反对南斯拉夫在伦敦的流亡政府回国的南共领导人，建立南斯拉夫联合政府，并于同年 11 月，促成双方在莫斯科的协商会谈。在 1945 年 2 月，欧洲战场形势已经很明朗，苏联红军没有英美的协助仍能够彻底打败希特勒军队，南共指挥的人民解放军已经完全控制了国内局势，在这种情况下，在雅尔塔会议上，苏联仍然同意了英国方面关于组成南斯拉夫联合

政府的意见。

当然，无庸讳言，在 1945～1947 年期间，苏联政府用各种方式积极促进了东欧各国联合政府向虽然多党并存，但共产党占主导地位的人民民主政权的过渡，但并没有谋求建立苏联模式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是 1947 年春季苏联和战时盟国的关系完全破裂以后，从当年秋季开始在东欧出现的。在此之前，建立共产党占主导的多党联合执政的人民民主政权的过程是通过两个阶段来完成的。

在这个过程中，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情况特殊一些，这两个国家基本上是靠自己的力量来获得民族解放的，且共产党在本国占有绝对优势的地位，因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得较早（两国均在 1946 年 1 月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共和国）。其他五国^①在冷战开始前政治发展第一阶段的特征是，在政治上，政府是由共产党和其他反法西斯政党的真正联合组成的。除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以外，这个联盟中，在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还包括农民党，在捷克斯洛伐克有天主教人民党等大小不同的政党。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基本上不超出民主改造的范围。第二阶段的特征是，在政治上，政府仍由各党联合组成，但这时共产党不仅领导了国内政治生活，而且对其他各执政党开始处于支配地位，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已开始为社会主义改造做准备。在这个过程中，苏联为实现其积极防御战略在东欧的既定计划，以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各种形式进行了主动的促进。例如，在 1944 年下半年苏联全力支持了波兰的卢布林政府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来对抗较有实力的米科拉伊奇科为首的农民党，直至使它的领导人流亡国外。1945 年 2 月，苏联第一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从莫斯科飞往罗马尼亚首都，指令国王米哈伊尔解除反苏反共的拉德斯库的职务，任命格罗查为新政

^① 民主德国这时还没有建立，故不在此列。

府总理。苏联还具体地指令参加联合政府的其他党派更换其领导人，以改变该党的政治倾向，如1945年2月，苏联在保加利亚驻军将领要求撤去C·M·季米特洛夫博士^①在农民联盟的职务，1947年2月，苏联宪兵逮捕了匈牙利小农党总书记科瓦奇·贝拉，苏联驻军在东欧各国无一例外地支持该国共产党牢牢控制了宣传，内务和军队三大要害部门，因而控制了战后初年的东欧政治发展态势，由苏联参加的在东欧建立的联合股份公司，在这些国家的经济生活中也有着重要影响。

在亚洲邻国继续建立安全带的努力

在战后初年，苏联在与自己接壤的东欧国家扶植和促进人民民主制度的同时，在自己的南部和东部边界继续为建立能够缓冲外来危险的安全带而努力，这表现在苏联对外蒙古问题的政策，对伊朗北部和土耳其的领土要求上。

中国的外蒙古地区是在中国辛亥革命时期由沙皇政府策动而于1911年12月宣告自治的。1919年11月，中国北京政府派军队进驻外蒙古，迫使其放弃自治，故在十月革命后初期，外蒙古又归中国政府管辖。苏俄国内战争期间，日英海军陆战队从海参崴登陆，日本曾一度占领外蒙古。1921年7月初，苏联红军在消灭入侵苏联远东的日军部队过程中，解放外蒙古首府库伦，改名为乌兰巴托（意为“红色战士之城”）。1921年7月11日，外蒙古再次宣布独立，建立君主立宪政府。1924年5月31日签订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曾载明：“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为中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1924年11月26日，外蒙古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仍然没有得到历届中国政府的承认。

外蒙古是一个四面封闭的内陆地区，一般说来它并不具备国际舞台上的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然而由于其位于苏联欧

^① 与保加利亚共产党人领袖格·季米特洛夫不是一人。

洲部分和远东滨海地区之间，尤其是位于连接苏联心脏地区与远东的大动脉——西伯利亚大铁路附近，这就赋予它对于苏联的重要战略意义。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起来，美国欲将中国作为其战后远东的最大基地与伙伴的战略意图，苏联已清楚地认识到。为了保卫自己远东地区以至整个东西伯利亚地区的安全，斯大林放弃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承认外蒙古为中国之一部分的立场。在雅尔塔会议上，苏联以对日作战为条件，提出了自己的战后远东方案，其中包括“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并将其写进了2月11日签订的《三大国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之中。^①虽然该协定有关事宜要征得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同意，但协定保证“苏联的这些要求应在战败日本后无条件地予以满足”，已经使事态事先就无法改变。1945年6月30日至8月14日，中国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后来是新任命的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苏联政府代表经过近一个半月的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中规定维持外蒙古现状，独立与否在战后投票表决。谈判期间，中国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成员蒋经国曾问及苏联方面一定坚持维持外蒙古独立的意图，斯大林曾明确指出这一地区对保证苏联远东地区 and 西伯利亚大铁路安全的重要性。

另外，位于外蒙古西北侧，北至萨彦岭南抵唐努山脉，在1914年初被沙俄军队强占的中国唐努乌梁海地区，在1944年10月被正式划归苏联，成立了图瓦人民共和国，3天后又改为俄罗斯联邦的一个自治州。

战后初年苏联与伊朗的外交冲突也可以被列入这一范畴。1941年8月，苏联政府根据1921年苏伊条约驻军伊朗，宣布自己的意图是防止希特勒军队从南部攻击苏联，也是为了保证来自英

^① 萨纳柯也夫，采布列夫斯基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58页。